

■文化视点

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

■李慧

最近，一套甲骨文手机表情包成为斗图圈的“新宠”，独特的传统文化符号竟与“神马、大神、有木有”等等网络流行词产生了一系列神奇的“化学反应”。袁枚的《苔》、北宋文学家苏轼的《定风波》、元代画家王冕的《墨梅》……古典诗词和现代音乐水乳交融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在观众中引发热烈反响。

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总是意蕴深长。今年两会期间，央视热播的大型文化节目《经典咏流传》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。清代诗人袁枚的《苔》、北宋文学家苏轼的《定风波》、元代画家王冕的《墨梅》……古典诗词和现代音乐水乳交融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在观众中引发热烈反响。不仅仅囿于古文字、古典诗词，传统文化已悄然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比如收获 200 万次点击的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，让那些平时身居深宫埋头修复文物的故宫工匠们，一时间成了“90 后”“00 后”心中的新“男神”，精美绝伦的文物在一双双神奇的手中重新焕发光彩。

比纪录片更火的，则是故宫紧跟时尚推出的“萌”系列文创产品。在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看来,故宫文创之所以火,是因为博物馆不再“高冷”,故宫的秘诀是“萌”,让皇家文化更接地气。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看山如此，感受传统文化也是如此。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时下，越来越多的国人陶醉于古典诗词的芳华流韵、国家宝藏的博大精深，并以此涵养着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丰富着自己的文化生活。

根植于中华大地的传统文化（据人民网）

特别的远古陶器陶鹰鼎欣赏



陶鹰鼎

陶，出于土，而炼就生活。它需要摔，需要捏，需要烧。制陶如塑人，在经过这些磨难之后，陶土便成了器，完成涅槃，变成神态各异的樣子。而它——陶鹰鼎则是中国远古陶器中最特别的一个。

它是六千年前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塑。仰韶文化以彩陶为最重要特色，器物多是生活用品，陶鹰鼎是唯一一件以鸟类为造型的。

它当初是做什么用的？——是盛水？储粮？还是祭祀？又为什么要把它做成鸟的样子？正因为它的唯一性，缺乏参考，所以这些问题还在吸引着研究者去探究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陶鹰鼎显示着六千年前，中国人的生活器具中，实用性与造型性已经可以达到非常美妙的融合。

六千年过去了，陶鹰鼎的制作地点、方式、方法、制作周期、烧制细节，都已经无据可考了。现代的制陶者，也只能靠着图片和想象，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赋予它新的生命。

这是一只有着胖胖腿的鹰，尾巴又和两只前爪巧妙地构成了

悦读

铜墨盒：鲜为人知的文房藏品

说起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，被人们广为熟知,而刻铜文房却鲜有知晓。其中，集书画艺术与雕刻艺术于一身的铜墨盒享有“最后的文玩”之称,在历史上曾经备受青睐。铜墨盒盛行于清中晚期,清末震钧著《天咫偶闻》中记载:“墨盒盛行，端硯日贱。宋代旧玩，不逾十金,贾人亦绝不识。士夫案头,墨盒之外,石硯寥寥。”铜墨盒所受青睐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铜墨盒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,但作为文房收藏的品类之一，铜墨盒仍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。

工艺考究 文人名士参与创作

铜墨盒从材质上分为紫铜、白铜、黄铜、纯银、黄铜镀银等，也有将紫铜、黄铜、白铜集于一身的“三镶”工艺，其造型有圆形、扇形、方形、古琴形、书卷形等。当时，由于砚台不便于随身携带，铜墨盒便成为替代砚台的重要用具。文人出门时，将墨汁倒在墨盒中的海绵上，需要写字时用毛笔直接蘸取海绵上的墨汁，省去了研墨时间，简便快捷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钢笔等更为便捷的书写工具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取代了毛笔，铜墨盒也就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。

在铜墨盒盛行时期，不少文人雅士、艺术名家不仅喜欢使用铜墨盒，更参与到其创作中。如民国初期，齐白石、陈师曾、姚茫父、金城等书画名家，常赴北京琉璃厂，切磋书画技艺。在尽情挥洒艺术才华的同时，这些书画家还时常为书画店负责人提供刻铜墨盒的画稿。如画家金城与刻铜名手张寿丞就曾合作制盒，金城笔法工细的花鸟的画稿，经张寿丞功力精湛的刀法刻于盒面，诠释出别具一格的金石之味。北京画院相关出版资料显示，张寿丞也曾向齐白石索取画稿，可佐证刻铜文房创制与书画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又如民国画家陈师曾常将梅、兰、竹、菊“四君子”题材的画作制

于墨盒之上并为其命名，这体现出他对铜墨盒的偏爱。民国名家姚茫父对于墨盒画稿的绘制情有独钟，他与琉璃厂经营印章墨盒店的张樾丞为好友，常合作创制刻铜作品，姚茫父将其对古物古学、瓦当碑帖与佛造像的兴趣与研究融入墨盒画稿中，独具韵味。

小众藏品 价格跨度较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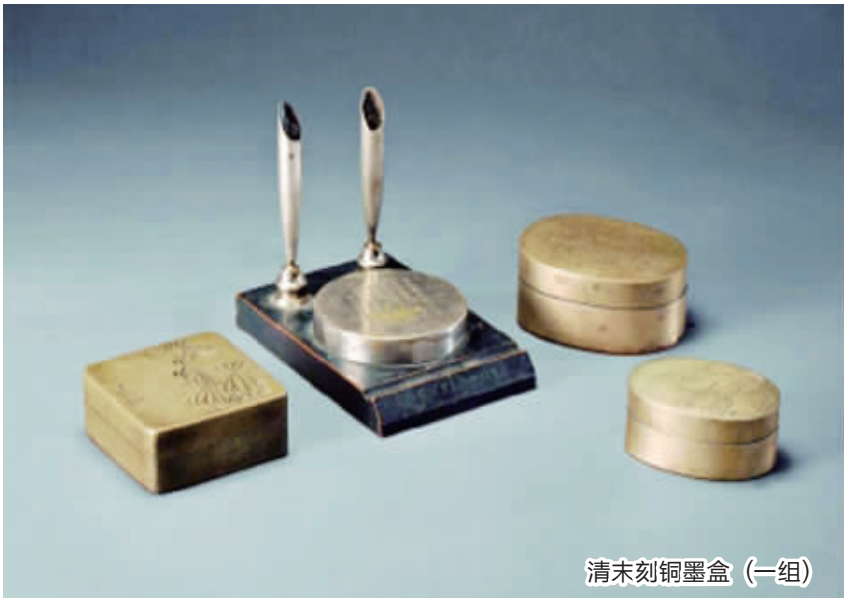
与传统书画和古董瓷器相比较，刻铜墨盒在当今市场中仍属小众范畴。然而，铜墨盒却以其质地坚固、造型小巧、画面雅致等特色赢得了一批忠实的收藏爱好者。据了解，自 2003 年起，这些收藏爱好者自发组织雅集与交流活动并一直延续至今，其中 2008 年、2010 年、2012 年、2014 年分别于北京、上海、湖南长沙、山东济南举办过 4 届全国性的文房刻铜雅集活动。

与清末民初较大规模的刻铜墨盒售卖群体相异,在当今市场里几乎没有专营刻铜一项的实体店铺,而刻铜仅作为文房杂项中的一部分,偶尔出现在市场一隅。

据笔者了解，整体上刻铜的价格呈现上涨趋势，根据墨盒的精美程度不同，单品价格从十余元到几十万元不等，偶尔也出现数十万元的高价单品，比如上海朵云轩在 2009 年春拍举办了“清风堂藏铜墨盒专场”，上拍标的铜墨盒仅 20 组，总成交额达 145.6 万元；又如 2012 年夏，上海某藏家在一次拍卖会中的唐云旧藏专场中以 37.95 万元拍得一方白石款花鸟题材圆形黄铜墨盒，也属于铜墨盒拍卖出现的较高价。

谨慎辨别 收藏铜墨盒需防范伪作

随着收藏的普及，铜墨盒已引起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兴趣，不少人都加入了收藏铜墨盒的队伍。对于大众收藏者来说，收藏铜墨盒需要多方面进行考量。如从外形上看，铜墨盒整体较坚固，但盒盖部分的边缘材质较薄，容易损坏。目前市面上流传下来的铜墨盒大部分因已被使用过，墨汁残留在盒内，经数十年的腐蚀，四角极易开裂，因而在购买时要特别注意墨盒盖边缘是否有开裂、



清末刻铜墨盒（一组）

破损的现象。

从工艺上来说，精品铜墨盒多出自名家，以工艺精湛著称。如陈寅生、张樾丞、姚茫父等的作品价值普遍高于普通作品。此外，使用特殊工艺制作、器形独特，或由著名书画家提供画稿、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关等因素，也会提升刻铜墨盒的收藏价值。

在材质方面，铜墨盒的材料多为白铜和黄铜。一般来说，用白铜制作的铜墨盒光泽柔亮，手感光滑细润，盒面上镌刻的文字和图案与黄铜材质的铜墨盒相较更具有表现力。但如果黄铜墨盒有极好的工艺，也值得收藏。另外，由白铜、黄铜、紫铜共同制造而成的“三镶”铜墨盒，由于市面上较少见，收藏价值较高。

此外，在收藏铜墨盒时，需要注意辨别旧盒旧仿、旧盒新款等造假现象。旧盒旧仿是指在民国期间制造出的仿品，因陈寅生、姚茫父等名家刻制的铜墨盒作品价格较高，大量赝品在民国时期就已流通，现在鉴定起来十分困难。以陈寅生作品为例，他的刻铜墨盒代表了明清时期乃至近代刻铜工艺的较高水平，

（据人民网）

家谱流传知多少？

孔子家谱历时 2500 余年



家谱

说起家谱，大家都不陌生，不少人家还保存着家谱，它是一个家族起源、世系传承、迁徙以及家族人物等情况的历史记录。

中国人重视家庭，重视家族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，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、影响时间最长、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。

最早的家谱 汉代以前记录王室贵族

家谱只是人们最常用的说法。在某种意义上讲，家谱是人另一种意义上的“身份证”，一种证明自己家族归属的身份证明。根据记载族群的范围与家谱属性的不同，较常见的名称还有宗谱、族谱、家乘、家牒等。

广义地说来，记载家族世系的文字都可以叫家谱。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，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。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，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，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。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，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。

商代晚期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，这就是金文家谱。金文是铸

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，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。

周代以后，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，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、功勋，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，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，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。

官修家谱 魏晋南北朝开始重视门第高下
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，在这一时期，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，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。当时从选官到婚姻，都要以家谱为凭，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家谱发展重要标志是国家设立谱局和谐官，专门从事谱牒编修和保管工作。

然而，魏晋南北朝的谱局和谐官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。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。按照规定，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，都必须呈送谱局，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、审定，然后收藏在谱局中，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，称为薄牒。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，称为谱系。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，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。由于经过官方审定的簿状是选官的重要依据，因此除了谱局收藏外，负责选官的机构也都有收藏。

家谱受到如此重视，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。曹魏建立后，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，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九等，以朝迁选拔官员之用。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，结果原本应该以德、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，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，出现了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的局面,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。

谱牒消亡 唐末门阀制度遭毁灭性打击

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，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，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:“谱系之学，莫盛于唐。”其实，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，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。

唐朝建立时，由于科举制的实行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，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，势力犹存。

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，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，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，贞观五年(631 年)，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《氏族志》。但当唐太宗翻开《氏族志》时，不由大为生气，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。修订后的《氏族志》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，将外戚列为第二等，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。

唐末五代时期，战乱频繁，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，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，所谓“天街踏遍公卿骨”，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谱牒也遭到焚毁，荡然无存。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。

私修家谱 宋代创制私谱范式

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。唐末五代的战乱，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，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，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，重修谱牒。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，家族在世系的开始变得模糊不清，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，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，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。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，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

宋代的时候，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，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，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，不需要再查看谱牒，因此，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。

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，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洵、黄庭坚、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。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，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，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，成为后世家谱典范，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流入寻常百姓家 明清纂修家谱成家族大事

进入明清以后，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，康熙、雍正都曾召纂

修家谱，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，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，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，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。清代不仅汉人修谱，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。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、出仕都要查验家谱，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。

与宋代的家谱相比，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，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，内容更加丰富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。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、世系、事迹、官职、得姓源流、迁徙情况、祠堂坟墓、族规家训、人物传记、艺文著作等。

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，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，出现了“会千万人于一家，统千百世于一人”的统谱，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，蔚为壮观。

家谱之最 孔子家谱传 80 世

在中国众多的家谱中，《孔子世家谱》有其独特的地位，历时 2500 余年，传 80 世，加之考订严谨，使之成为民间修谱中记载世系最久远、最可靠的一部家谱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孔氏家族正式有谱始于宋元丰七年（1084 年），迄今 900 多年。在此之前，孔府虽然也有家谱，但只载嫡长承袭者一人，且是抄本传世，很不完整。孔子第 46 代孙孔宗翰感到抄本易散失，而且只记载承袭者，其余族中贤达显贵不能入谱，日久年深，难免湮没无闻，于是创修孔氏家谱，在以后的 400 年间，曾有过多次的修谱，但是都没能刊印，内容也比较简单。

到明孝宗弘治二年（1489 年），孔子第 61 世孙孔弘干重修家谱，并规定以后孔氏家谱 60 年一大修，30 年一小修，大修以甲子年为期，小修以甲午年为期。不过，这一规定并没有被认真执行，在孔弘干修谱后的 130 多年后，孔府才再次重修家谱。成于明天启二年（1622 年）的《孔氏族谱》现仅存残卷三卷，当时共印了 98 部，这也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正式的孔氏家谱。在此后的 300 多年间，孔氏家谱仅续修了 4 次，也就是明天启《孔氏家谱》、清康熙《孔子世家谱》、清乾隆《孔子世家谱》、民国《孔子世家谱》。

（据人民网）